

CSSCI 来源集刊

JIN DAI ZHONG GUO

近代中国

上海中山学社主办

【第三十二辑】

近代政治与军事 · 近代经济社会 · 近代思想与文化

近代慈善与医学 · 学术动态与考辨 · 史料辑存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 . 第三十二辑 / 上海中山学社编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0

ISBN 978 - 7 - 5520 - 2442 - 5

I. ①近… II. ①上…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90194 号

近代中国(第三十二辑)

编 者: 上海中山学社

责任编辑: 杨 国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 sassp@sassp.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龙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插 页: 2

字 数: 317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2442 - 5/K · 563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近代政治与军事

- 民国前期山西财政军事化初探 张文俊 / 3
- 朝鲜壬午兵变清朝的出兵决策考述 王奕斐 / 25
- 二战后海南岛的改省之议与省制纠结
——以张发奎的活动为主线 刘东庆 / 41
- 从汉奸到战犯：二战后国民政府处置“台籍汉奸”的
法律转换及争议 张雅倩 / 61

近代经济社会

- 裁厘改税和民国时期央地财政关系的转变 于 广 / 81
- 困境与复兴：1933—1934 年招商局的庚款购船活动
..... 姚清铁 李瑞尧 / 102
- “川政统一”与“建设后方”
——全面抗战前成渝铁路内资引进活动研究 陈鹏飞 / 122

近代思想与文化

- 《中国丛报》停刊原因新探 鲍晓婉 / 139
- 20 世纪初日本外务省的对华舆论操控
——以《同文沪报》为例的考察 王 萌 / 153

梁启超交游新证

——由梁启超致吴秋辉之佚札谈起…………… 刘迎秋/ 172

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面相

——以历史组为中心的探讨…………… 刘春强/ 185

民国学人的“维护”与“忧虑”

——以白眉初所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为中心…………… 朱丽晖/ 211

近代慈善与医学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之历史演进(1895—1945)

…………… 周秋光 庄细细/ 233

南京国民政府与“慈善义演”关系研究

——以义演活动组织为中心(1927—1937)

…………… 郭常英 韩星耀/ 253

1928—1929年绥远鼠疫的突发与政府防治

——以绥远临时防疫处为中心…………… 郝平 魏春羊/ 276

万能医学还是敛财妙术

——域外红疗在民国时期的传播和衰落…………… 芦笛/ 289

学术动态与考辨

改革开放以来孙中山金融思想研究述评

…………… 章义和 徐沈/ 315

吴禄贞《沿途日记》的作者、藏者及价值考辨…………… 王富聪/ 335

章太炎肄业诂经精舍考…………… 刘明/ 347

史料辑存

蔡元培史料拾遗续编…………… 周雷鸣 李晓芳整理/ 373

征稿启事…………… / 400

近代政治与军事

民国前期山西财政军事化初探

张文俊

财政是国家政权运行之血脉,关系社会秩序存废。晚清至民国,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膨胀,国家权力断层,中央收入时被地方截留。晚清关、盐两税大半留归各省。民国鼎造,善后借款成立,关、盐两税另行存储,各省收入暂时骤减。^① 中央财政收入虽有一定增长,但主要来自奉、鲁、晋等省的盐税。其时,政治地方主义崛起,国家财权多被地方窃取,使得民国前期税目繁杂。国家税有田赋、盐课、关税、常税、统捐、厘金、矿税、契税、牙税、当税、牙捐、当捐、烟税、酒税、茶税、糖税、渔业税。地方税有田赋附加税、商税、牲畜税、粮米捐、土膏捐、油捐、酱油捐、船捐、杂货捐、店捐、房捐、戏捐、车捐、乐户捐、茶馆捐、饭馆捐、肉捐、鱼捐、屠捐和其他杂税。可这些税目远未满足财政需求,随之,印花税、登录税、继承税、营业税、所得税、出产税、纸币发行税增加为国家税;房屋税、国家不课税之营业税、国家不课税之消费税、入市税、使用物税、使用人税、营业附加税和所得附加税增设为地方税。^②

民国前期的山西是阎锡山控制的准独立政权,其税赋在此基础上又有着自身特色。财政收入有田赋、厘金、正杂各税、正杂各

①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印行,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107—112页。

捐与杂收入,支出有内务费、财政费、陆军费、司法费、教育费、农商费和交通费等。那么,其财政收入和支出比重如何?兹将1913年、1914年与1916年山西的财政收支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山西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军费支出最多,内务费次之^①。可见,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山西财政的显著特征是军事化突出,可谓财政军事化。那么,财政军事化是如何运作的?其又是如何实现的?财政军事化对民国山西的经济及社会有何影响?诸如此类问题,迄今为止,学界在民国山西研究或阎锡山研究中,仅谈及阎锡山在山西经济治理中的现代化问题以及修建窄轨铁路中的财政考量,而对民国前期山西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问题鲜有论及。其实,探究民国前期山西财政收支,不仅可以揭示阎锡山创造“准独立政权”的财政基础,而且亦可反映民国社会转型中财政的混乱以及民国时期财政弊端之多重面相。

一、税收来源

民国前期山西税收来源除前文所述的收入途径外,阎锡山控制山西后,为增加财政收入,另辟蹊径开创了多种收入渠道,如推行包税制度、设立铜元局私铸铜元、征收房屋税、发行公债、征收地亩捐等,各种税目不一而足。

(一) 推行包税制度

阎锡山兼任省长后,呈请财政部援照河南成例,将全省厘税改归商办,财政部批准试办。其预算每年较原数增加约1000余万元。^②由此,山西税务实行包办制度,一切厘厘改为包办。税务包办对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推行过程中,因商人贪婪,

① 内务费,即维系庞大官僚机构的办公费用。

② 《晋税务改归商办》,《晨报》1918年12月6日,第6版。

单位：元

表 1 山西三年财政收支状况分布表

1913年	田赋	厘金	正杂各税	正杂各捐	官业收入	杂收入	共计
收入	4 146 440	808 743	833 678	5 257		633 810	6 427 928
支出	内务费	财政费	陆军费	司法费	教育费	农商费	共计
	1 537 156	314 914	3 804 648	799 220	30 000	231 170	6 721 369
1914年	田赋	货物税	正杂各税	正杂各捐	官业收入	杂收入	共计
收入	4 344 491	910 380	277 801	13 687		60 000	5 606 359
支出	内务费	财政费	陆军费	司法费	教育费	农商费	共计
	1 588 970	204 886	3 171 740	270 000	100 000	4 000	5 339 596
1916年	田赋	货物税	正杂各税	正杂各捐	官业收入	杂收入	共计
收入	5 949 516	776 380	525 317	93 074		66 051	7 410 338
支出	内务费	财政费	陆军费	司法费	教育费	农商费	共计
	1 886 838	498 751	2 339 000	290 000	440 705	21 191	5 476 485
							盈 1 933 853

资料来源：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印行，第79—103页。

此种征税制度亦不免出现伤民现象。如山西平定县某村一农民，养7头牛，因年荒，想要拍卖牛，牛仅卖5元钱，没人要。农民实在无法度日，就杀了1头牛，不料被包税人得知，非要农民交1元大洋的割头捐。^①农民说：“这个牛通共还不值一元钱。你今天割头捐就要一元，那么，你把这个牛拿去好了。”可税官不要牛，只要1元钱，并用棍打勒索农民。农民没有生路可寻，进行抵抗，闹成官司。幸而县知事讲理，没有罚办农民，亦没有让其出割头捐，了结了纠纷。^②然伤农现象的出现及包税制度在特定时期的不合理性，并未影响其实行。

（二）设铜元局铸造铜元

民国初年，山西金融紊乱，市面流通多种钱币。山西地处偏僻，矿产较多，交通只有正太铁路通到太原，平绥铁路经过大同，除少有的几条长途汽车路外，其余都是邮局所谓“土”的交通。因此，山西货币与外界不同。银币有宝银、纹银、元色银、大洋、小洋之分。钱币有制钱、铜元、钱票之别。商家交易别具特色，巧立名目，银之成色高下、天秤大小、制钱短数、钱票涨跌均是奸商伸缩市价的余地，农民受害之深。^③交通闭塞的县份只用生银和制钱，完粮纳税按照银元计算（亦从银子合成银元），收税时仍用生银。太原府只用“袁世凯头”的银元和“北洋站人头”的银元等。^④

为改变币制混乱状况，阎锡山有一亲信建议收买制钱，改铸铜元。阎花费5万余元向杭州造币局购买机器，其余零星小件额外添配，于1919年在太原府北门外修械所内设铜元局，制造“当十”

① 其时割头捐为1牛1元。

② 《山西之苛令害及灾民》，《晨报》1920年10月16日，第6版。

③ 《山西币制之今昔》，《晨报》1923年5月8日，第7版。

④ 1919年，大洋1元可折换银子7钱4分，折合起来加上成色可换铜元130余枚，换小洋11角，换制钱1400余文。《阎锡山私铸轻质铜元之黑幕》，《晨报》1923年2月13日，第6版。

铜币。铜币模子和别省铜币一模一样,只是加“山西省造”四字,以与它省区分。铜元制成后被运到天津和石家庄等处,其在市面难以流通,45万枚铜元不得不收回改铸,山西损失6万余元。为何私铸铜元不能流通?一是当时福建和安徽等省轻质铜币尚未出现,山西铜币分量与成色较之通用铜币略显轻;二是铜元局人员舞弊太甚。受此挫折,阎锡山计划停办铜元局,可其亲信仍坚持,一面调查局内情况,一面改良铸造办法。于是,阎又委任李某经理一切,责成各县知事收买制钱,省府负担运费,每100里路发钱1500文,每车可装1000余斤制钱,规定各县钱店只能领换铜元,并发铜元票。当时市价每一大洋可换铜元150枚,钱店一个大洋可换到158枚铜元。在政府推动下,钱店极力将制钱改换铜元,使铜元价格由一个大洋换146枚涨到只能换138枚,制钱逐渐减少,铜元票充斥市场。^①

轻质铜元币除在山西流通外,还走向全国市场。铜元局每天制造铜元20万枚^②,从开厂到1923年经过三年多,制造量总计约2亿枚。“当二十”铜元占25%，“当十”铜元占0.0125%，各地发行铜元票达到1亿枚,每县可吸纳100万枚,山西105县可消纳1亿枚左右,其余输送到上海、天津、汉口等处。自该局成立后,山西经济运转十分灵活,虽有过几次借款,但财政收入相对富足。^③阎锡山从铜元币获益后,在1924年9月扩大铜元局规模,置办数架新机器,派员赴武汉购买约57.6万斤红铜,每车载3.6万斤,在汉口共装16辆列车,经过郑州改由正太车转运到晋省交通局核收,备铸新币。^④

不过,制造铜元币亦产生了消极影响。山西金融素称富裕,在

① 《阎锡山私铸轻质铜元之黑幕》,《晨报》1923年2月13日,第6版。

② 有人说25万。

③ 《阎锡山私铸轻质铜元之黑幕》,《晨报》1923年2月13日,第6版。

④ 《晋省购铜铸币》,《晨报》1924年9月18日,第7版。

前清时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钱业非常发达。民国以来，钱帖盛行，滥发者时有倒闭，可危害不大。阎锡山制造铜元时期，将各县制钱收括殆尽，钱商由制钱与宝银的买卖转向银元与铜元之买卖。1919年，每银元1元可换铜元140枚，1923年时则换到铜元228枚，相差之巨，各地皆然。初制时，铜元不多，且阎锡山极力向外省推销铜元，各县钱商为周转市面并得阎锡山许可，发行逾量铜元票，但时间一长外省流通呆滞，分布在山西各县的铜元票充足且价格降低，纸币受影响，票号倒闭者甚多，两年倒歇者竟达200余家，少数票号亏空不支。^①

（三）征收房屋税和商号登记税

阎锡山为增加军饷，起征房屋税和商号登记税。1924年12月22日，山西军署召集财政会议，晋北镇守使赵戴文、军署参谋长台寿民、财政厅长杨兆秦、政务厅长孟元文等十余人参会，阎锡山指出参加直奉联军攻打国民军的重要性，参战就需要增兵，增兵就需要解决军饷。对解决军饷问题，他想到两种办法，一是减薪，二是增税。减薪在20日的军事会议已定有大概，即各团营不论军官或军佐，薪公各费一律按原定数目的七折发给。至于增税，政府打算征收房屋税和商号登记税，改订烟酒费税和各项厘税。这些措施即使推行后，每年全省收入和支出相抵，不足之数仍有200余万元。接着，参会人员将财政厅拟定各税办法详加研究，讨论结果为：（1）新增房屋捐。民间所有房屋，按房屋所在地，每年征收房屋捐，捐额暂定为三等，一等房每间捐洋五角，二等房每间捐洋三角，三等房每间捐洋一角。（2）增加商号登记税。商店在城镇乡村有固定地址者须向县知事公署登记，登记时按商店资本的5/1000征收费用。其他沿途小商人亦须在县知事公署领得牌照，始可营业。牌照费按商业种类交纳。（3）改订烟酒费税等。自

^① 《山西金融界前途之厄运》，《晨报》1923年12月15日，第7版。

1925年1月起,此项费税均按原额再加20%征收。牲畜税和屠宰税按原额加50%征收。^①

(四) 发行公债、征收田亩捐和房屋捐

对于军事费用的巨额亏空,阎锡山通过发行公债、征收田亩捐和房屋捐填补。1926年雁北战事结束后,省府细加综核,共计欠外债达1500万元之多,其绝大部分是欠商家。各商家以连年时局不靖、商业日衰和税收负担为由,催促政府体恤商艰归还欠款。政府考虑信用问题,答应设法归还,但库空如洗,只好再次向民间伸手,决定暂加地亩捐,以两年为限,每年可增收入300余万元。此外,政府发行公债400万元,由商富均摊。^②

其余之数由省府设法筹措,各县负责筹备。那么,各县又如何筹措?山西在民国时期以农业为主,工业不甚发达,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及利用十分有限。因此,各县奉省令后,只能在土地上想办法,试图征收田亩捐。各县土地有以“段”计者或以“垧”计者,旱田有原、平、沙、坡、碱之别,水田有大、小之分,如果按照省令实行摊派,各县困难殊多。如果将“段”“垧”折合为亩,亦非数月不能成功。各县纷纷呈电向省府请示,阎锡山令各县将“段”“垧”折成亩数,旱田分上、中、下三等,水田分活水、洪水二种,征收地亩捐。然各县着手办理之际,太原忽有反对地亩捐的请愿团出现。该团多次赴晋绥总司令部请愿并要求迅速取消此捐,以纾民困。阎不得已慨然允诺,立即责令各县宣布免除地亩捐。^③

除征收地亩捐外,山西还向各县商富户派销债券。太原总商会就此项临时捐款多次催促各商家缴纳,可收效甚微。1927年3月29日,太原总商会特发通告,催各行号限期照缴,总数为

① 《阎锡山扩充军备》,《晨报》1925年1月19日,第5版。

② 《阎锡山积极筹军费》,《晨报》1927年5月17日,第5版。

③ 同上,第5版。

12万元,具体做法是:“由阳曲县署向关厢村镇商号分派二万元,由本会向各商行分派十万元,并经共同表决,仍按资本为标准,照千分之二十五抽收,惟款已奉拨,各军旅之薪饷,催索甚急,刻不容缓,自本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限四日内一律照数缴会,不得稍事延缓。”^①面对军需用款急如星火,在款项无着落时,省府再次重提地亩捐,下等地由原来每亩定为6分改为5分2厘,令知各县迅速照办,并于5月15日前一律汇解到省,以济急需。阳曲县知事张敬灏奉令后,当即令各村村民迅速交纳。各村长副奉令后,召集街闾邻长多次讨论办法,表决遵照县令实行,于是该县村民入城交款者络绎不绝。可地亩捐虽经实行,仍不敷分配,政府决定起征房屋捐^②。警务处长南桂馨令各区署调查太原市商民房屋总数,于5月14日缴齐。房屋捐款分为一、二、三、四等,按院大小、房屋多寡、新房或旧房评定等次。一等院落每所捐银25元,二等每所捐银20元,三等每所捐银15元,四等每所捐银5元。各街办公所连日会议讨论房屋捐未获结果,却反使房价增涨,租房费上涨。一些房东利用机会企图从中牟取小利。^③另因棉花一项为出入口商货大宗,省府令各县于正税外加抽棉花特捐,规定在出境或入境时征收棉捐一次,每100斤抽收8角。5月23日,拟令各口岸县份与各统税征收局设卡办理。^④

流通券的发行亦是政府因应浩大军费不济的一项重要举措。山西为救济雁北13县,发行善后流通券200万元,在各县组织当业抵产局。具体实施办法是,民众不动产值2元者,可领取流通券1元。多者类推,市面流转须与现洋一律,不得私自折扣。浑源县某钱店以折扣收买该券,被县知事查悉罚金数百元,

① 《山西之商富捐》,《大公报》1927年3月30日,第6版。

② 山西向无此种捐款,在外省有房捐、铺捐及其他种种名目。

③ 《阎锡山积极筹军费》,《晨报》1927年5月17日,第5版。

④ 《晋省征收棉花特税》,《晨报》1927年5月24日,第7版。

其余各县不敢效尤。乡民纳税可凭此券,各军政机关人员发放薪饷亦附发该券数成。流通券虽已在市面流通,但各商户未接商会通知,大多不肯收受,导致当街市面争执者触目皆是。为改变困境,总商会屡次请示,未得具体答复。后政府鉴于争执日见增多,又值戒严期,避免因小故酿成大祸,想出一项具体实施办法,即凡购物在1元以上者允许以此券偿值,1元5角可抵现洋1元,1元以下者一概不准通行。政府虽有规定,但一般无赖和奸商仍有不遵守者,由此争吵者时有所闻。据当业中某君谈道:“该券之争执,犹以当业为尤甚。盖因该业当出之款,皆系现洋,及来赎时,皆以流通券相抵。其资本较少者,前时已有三家,暂停营业。资本较厚者,虽能苟延残喘,然大多数门口皆贴‘止当候赎’字样。其次为军衣庄,前时发行之金库券以之购物,尚与现洋无异,若调换现洋,仍得吃点小亏。各街上之小钱摊见有利可图,均争相收买,皆挂有小招牌上书‘代收金库券’。盖该券虽为六个月期满,可兑现洋,然用钱紧急之人,万难搁置六个月,以贪图6厘之小利也。如有需用现洋用途时,不得不随时出售,故一转眼间,而小钱摊则竟大获其利。”^①从而使得奸商横行,流通市场混乱,普通民众经济受损。

(五)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亦是山西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不过,从它刍议到实行经历了一番官民之间的博弈,终以官方胜利告终。1920年,山西发生旱荒,绅、商对政府的捐税与催科不满,纷纷要求蠲缓税收。恰值其时财政部提倡征收所得税,所得税命令公布后,财政部接连不断收到各种反对函电,其中就有山西商会的反对电。10月23日,山西总商会电北京政府“报载中央对于所得税已经议决实行,唯查晋省岁遭大祲,百业萧条,衣食尚待赈恤,何堪重加担

^① 《阎锡山积极筹军费》,《晨报》1927年5月17日,第5版。

负,迅请从缓办理,以恤商艰”。^①因商民反对,山西征收所得税之议被迫搁置。^②但阎锡山仍对受灾县征收粮赋。以阳曲县为例,1920年数月亢旱,县内180余村收获只足一成。乡民啼饥号寒,十分悲惨,可阎不允许县知事据实呈报灾情,如有报者,阎则另委专员严酷勘查。为何不让上报灾情?原因是阎锡山为征粮做准备,他认为如果灾情一旦上报,在时人眼中民间何有多余粮食供给政府,这显然影响政府的征粮。故他令县知事催逼钱粮,限期缴纳,倘或延缓,即行拘禁。^③对此,山西旅京同乡会函电阎,劝其勿要在灾荒中催科:“拟恳应停止润金抽扣,免蹈诛伐无厌之名,于凶荒之世,此请停止苛罚者一也。”^④然政府面对浩大军费开支,不顾士绅反对,却继续征收捐税,于1927年7月18日出台征收所得税政纲,^⑤起征个人所得税。

二、截留烟酒税与中央博弈

中央税收“被地方化”是山西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1917年,民国北京政府欲以烟酒公卖抵押借美款,安徽省长倪嗣冲得此消息则于5月31日通电全国:“府院方面现借美款业有成议,将以烟酒公卖抵押,并饬财部赶印债票备用,务请迅推张勋领衔,飞电驻京美使,声明对于此款不能承认,奸党擅借。属内地方所有烟酒公卖局所概应暂行停办,或归地方官直接办理,免资利用。”^⑥阎锡山

① 《晋商会电请缓办所得税》,《晨报》1920年10月24日,第6版。

② 《晋省征收所得税》,《晨报》1927年7月24日,第6版。

③ 《阎锡山救灾声中之虐政》,《晨报》1920年11月24日,第3版。

④ 《山西灾荒中催科之反响》,《晨报》1920年11月4日,第3版。

⑤ 《晋省征收所得税》,《晨报》1927年7月24日,第6版。

⑥ 《倪嗣冲电张勋等请迅推张勋领衔制止中央借用美款》,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二册),台北“国史馆”印行,2003年,第106页。

亦于6月1日电张勋等：“顷接倪省长电，府院方面现借美款业有成议，将以全国烟酒公卖作抵押，并印债票备用，嘱即飞电驻京美使，声明对于此款不能承认，奸党擅借等因。竭全国之脂膏，供无名之挥霍，此等举动断难承认。倪省长主张办法，极表赞同，即请绍帅（张勋）挈銜，电致驻京美使，以杜狡谋。”^①阎这样做是想借机将烟酒公卖收益归于地方，为此，特于6月12日电赵倜等进行商讨：“烟酒公卖扰商病民，前因公府抵借美款，曾经联电反对，丹忱（倪嗣冲）省长并有停办或收归地方之议。敝处自宣告脱离，业将该局收归财政厅管辖，尚未停办，未知尊处办法若何，又盐运署、樵运局、中国银行、铁路、邮电各款，尊处如何处置，统乞赐示，以便仿行。”^②蚌埠倪嗣冲和济南张怀芝积极响应阎电。倪建议：“敝处自宣告脱离后，公卖局亦收归财厅。银行则派员查账监视，以维金融。邮电亦各派员检查。盐款、路款并未干涉。”^③张怀芝以为：“承询烟酒公卖及财厅运署银行一切应解中央款项，敝处现已全行扣留。俟大局解决，再行妥议。”^④阎锡山对此未表态，而早已将公卖局烟款作为晋省财政收入之重要部分。他不仅要截留中央的烟酒税收，而且还要截留中央盐税，于1919年7月13日电国务院，拟安插亲信马骏整理河东盐务，进而涉入盐政，^⑤未获中央同意。其收归盐税企图直到北京政变后才得以实现。

^① 《阎锡山电张勋等》，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二册），第107页。

^② 《阎锡山电赵倜等》，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二册），第110页。

^③ 《倪嗣冲电阎锡山烟酒邮电等款处置方式》，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二册），第111页。

^④ 《张怀芝电阎锡山烟酒邮电等款处置方式》，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二册），第111页。

^⑤ 《阎锡山电国务院等》，叶慧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台北“国史馆”印行，2003年，第651—652页。